

紧密联系实际, 进一步拓宽、 加深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李 守 庸

处在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向前发展, 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继续贯彻落实, “左”倾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不断得到拨正, 西方学术文化受到重新批判地认识、对待, 经济学科渐显勃兴之势, 而历史学界纷纷议论史学危机的重要时刻, 作为介乎经济学科与历史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究竟应当怎样估量本学科当前的地位与形势, 怎样拓宽与加深本学科的研究工作, 以及怎样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 是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以至中国经济史学科工作的同志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下面说一些初步看法, 作为引玉之砖, 并就正于读者。

(一)

近年来我们对于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与目的议论得比较多, 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若干篇; 批判地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遗产, 作为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借鉴, 无疑属于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大意义之一。仅就这一点而言, 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向前发展, 而又出现诸多经济理论问题正有待人们不断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的今天, 理应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然而在从事本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中间, 学科不受社会重视的失落感却相当普遍地存在, 甚至有与日俱增之势。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解释这种现象呢?

第一, 我认为应当恰当地估量本学科当前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自有其长期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的、历史的价值。至于在当前, 就其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而言, 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经济理论上自应首先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所出现、存在的诸般现实经济问题。而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 得出正确的结论, 经济理论本身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学习、再认识问题, 有一个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再认识和批判借鉴的问题, 还有对中外历史包括经济史、社会史及许多边缘学科的研究、借鉴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必须也必能作出自身应有的学术、理论贡献, 但应看到这种贡献有一定的范围, 一定的限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 有的可能其社会需要更为迫切, 其当前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也较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为大。承认这一客观事实, 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作恰如其分的估量, 可能有助于摆脱或减少某些思想困惑。

第二, 我认为要看到学术、理论工作在某种范围内或某种程度上不被社会重视, 这种现

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有些时弊有关；同时还要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客观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需要一个被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以目前高等学校而论，有相当一部分文科专业的学生，对那些在他们看来与其就业前途无直接关系的理论课程提不起兴趣，还有一部分则甚至对其所学专业整个感到失望，感到不如弃学从商、从政。在这种气氛之下，作为经济类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之一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开设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是不足为奇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本学科专业人员所能独立解决的，尽管我们应当作出自己的努力。再就近年来本学科科研进展情况看，形势似乎还可稍许乐观一些。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至今，一年半时间之内，本学科有关专著或教材已出版若干种，还有若干种正在出版过程中。至于本学科公开发表的论文，我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约略计算了一下。解放前1900—1949年50年间共466篇，平均每年不到10篇，每月不到1篇；1949年10月——1981年12月32年间共494篇，平均每年不到16篇，每月不到2篇（据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编《经济资料第五、六册》）。而去年（1987年）一年来公开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仅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复印报刊资料》目录所载，已达到172篇，平均每月超过14篇。即令排除统计上的差误和某些不可比的因素，我认为，这个统计数字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正在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所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举172篇论文的作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专业人员。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工作，是大有可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紧密联系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二）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紧密联系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这既是史学必须服务于社会的社会需要，同时也是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的必由之路。至于如何联系实际，我感到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批判地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我认为，这是在本学科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研究的过程中，以及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安排上都必须首先着重注意的问题。

由于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而经济思想又不外是一定历史时期，在人类划分为阶级之后又是生活在一定阶级范围之内的人们对于客观的社会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的反映和认识，这些反映和认识又构成一定的经济观点，经济理论，经济学说，经济政策，因此，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以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作为借鉴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借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但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经济生活、经济关系，有助于我们端正某些经济观念，以至于有助于我们在某些方面制订正确的经济政策，则是一致的。如果这种看法可以成立，那么立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领域里就有许许多多的课题有待于我们去作深入的研究了。比如说，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农、工、商的关系，恐怕不能说现在这个问题已完全解决，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已获得一致的、符合实际和符合经济发展

客观要求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前些年,我们有时或有人强调“无工不富”,有时或有人又强调“无农不稳”;近年来,在搞活经济、搞活流通的客观要求和有关政策调动之下,从全国范围来说商业是搞活了,但在有的时候,有的地区,却发生了部分农民改业从工、从商之后由于处理不当而影响粮食以至经济作物、家畜家禽生产的现象,甚至使相当大范围之内的市场供应受到影响。这些现象如果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也可以说是象中国这样原来的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类问题不但中国会遇到,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往往会遇到。我的老师张培刚教授,早在四十年代中期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时,就曾以《农业与工业化》为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后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出版。这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该书曾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自几年前这本书的中译本问世之后,张培刚教授计划将全书扩大为三卷,仍冠以《农业与工业化》的总标题,已经出版的那一本作为上卷,加上分标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而在数年之内将写成中卷《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和下卷《社会主义中国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陆续出版。我在这里介绍张培刚教授的研究成果和计划,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探讨象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是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而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说,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本末观,对于探讨当前这个重大课题,无疑将具有借鉴的、启发的意义。又比如说,我国当前正处在由传统的、封闭型的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到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办事的、开放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新旧体制的交替中。而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的结构及其相应的经济机制的运行,从理论上说,又与经济干预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斗争进行了数百年,而且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斗争仍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主线。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从先秦直到近代,经济干预思想和经济放任思想的斗争可以说绵延不断,有关这方面的经济思想史料可称相当丰富。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干预与经济放任思想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得出某些实事求是的判断或结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决策,就有可能提供直接的、有益的借鉴。

再从教学上说,如果我们在中国经济思想史或与其有关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出发,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有意义的经济观点、经济理论、经济学说、经济政策,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这也许是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并使其获得有用知识的一种重要方式。

第二,为了紧密联系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几十年来“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依据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对从先秦直到近现代的中国经济思想遗产进行多方位的、多层次的、全面的总结。

我始终认为,建国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 and 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学术上取得的进展和成果与建国之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这些成绩的获得,又是与我们在研究中运用了新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分不开的。但是,无庸讳言,由于时代环境的制约,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理论武器运用得不够好,甚至可以说出了偏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有

某些失当之处。人类自划分为阶级，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到阶级消失之前，各种社会思想，包括经济思想在内，都会受一定阶级条件的制约、影响，这一点似应无疑义。但制约、影响各种社会思想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又绝不止于阶级这一个条件，而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诸如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历史传统条件，民族心理条件，个人修养、气质条件，以及各种思想相互之间的影响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在制约、影响经济思想的各种条件中，我仍然认为经济条件最为重要，其次可能就要数阶级条件，再其次则为其他诸种条件；我甚至还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原始社会之后，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经济思想的历史的一条红线，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的。而我们过去的失误之处，则在于过分强调了这条红线，过分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尽管在我们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中，问题不象历史学界有人对建国以来史学研究所作的形容那样严重，把红线搞成了红布，但仍然由于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而致使我们研究的领域和深度都受到过不应有的限制。至于在灾难深重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甚至要以儒法斗争作为贯彻古今的历史线索的谬说，也不能说对我们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曾产生过有害的影响。二是在学术必须服从政治，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之下，往往用一时的政治要求、政治标准，来决定课题、人物、思想资料的取舍，以至来揣摩和升降对一个人物、一部著作及其经济思想的评价。这就不仅使我们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显然贬损了我们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甚至会全然丧失经济思想遗产的历史借鉴意义。

以上所说偏差，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有所纠正、克服。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不是短期内所能完全摆脱的。当前，为了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正确运用。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就是要依据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如选题的角度，取材的角度，构架的角度，时代的角度，借鉴的角度等等），和不同的层次（如经济观点，经济理论，经济学说，经济政策等等），对中国从先秦直到近现代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进行全面的总结。只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才有可能描绘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本来面目；只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才有可能避免牵强附会之类影射史学的重现，使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中获取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借鉴；只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社会功能，并从而增重其社会价值。当然，我这里只是说的“极其重要的一点”，只是说的“才有可能”。要达到上述目的，显然离不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全面的学习、研究和正确运用，以及其他具有科学因素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

第三，在强调紧密联系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以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并不排除也不应当排除对那些看来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直接借鉴关系的课题的研究。联系实际是开拓与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为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也不等于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唯一宗旨。那种在眼前看来、在表面看来无甚实用价值，而其研究成果却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的研究课题，在许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里存在，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里也同样存在。我们要提倡紧密联系实际，提倡学科研究成果为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但也一定要努力避免研究工作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三)

在能够较为正确地估量本学科当前的地位与形势,进一步摆脱“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学习、研究和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引进其他具有科学因素的新的研究方法,而整个学术环境逐步转向宽松的条件之下,我想,我们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第一,就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个体研究而言,如果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需要而去总结一个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是非得失,从中吸取正面或反面的历史借鉴,这是很可能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拓宽和加深的。近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的当今社会功能、社会价值问题引起学术界较为广泛的兴趣和较为热烈的讨论就是一例。尽管具有象孔子那样巨大思想影响的思想家不多,但比孔子经济思想为丰富者却大有人在。再说直到目前为止,就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著作而较为全面、专门地探讨其经济思想的学术专著,面世的也寥寥无几,相对于我国丰富多彩的经济思想历史遗产而言,等待我们去完成的工作量是极大的。此外还有不少历史人物或著作的经济思想至今我们还完全没有去触动。如果立足于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这样的历史人物或著作将会更多。仅以赵迺抃教授遗著《披沙录》第一卷下集乙部第47项所举明朝人陈子龙撰《皇朝经世文编》五百卷为例,赵迺抃教授认为该《文编》所载“颇富有经济思想”的作者就有三十余人。而据我所知,这三十余人中其经济思想为人们所研究或接触过的,不过十人左右而已。至于对“五四”以来历史人物以至对当代人物的经济思想的研究,目前只能说刚刚开了一个头,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开拓又是极富有现实意义的。

第二,对于某一经济思想专题,联系其各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从纵的方面作历史的探讨,从这中间是有可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理论、政策上的经验教训,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面或反面的借鉴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论文不多,专著更少。除了上面列举过的象中国历史上的本末观,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干预与经济放任思想以外,诸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观,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思想,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思想,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富民与富国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商品流通思想,中国历史上的消费思想等等课题,是可以也应当容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反复的探索,形成不同观点、不同风格的论文以至专著的。即令是当前有较多同志从事并已取得一定成果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领域,也不能说研究工作已经尽善尽美,可以就此止步,不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了。

第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通史的建设方面,建国以来是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已经有好几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面世。但也不能说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或做得差不多了。还不说如果我们进一步摆脱了“左”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观点、方法来结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体系,使这方面有更多的新著面世;而且,仅从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大国来说,原有的几部通史性著作也是远远满足不了要求的。以台湾一个省而论,仅就我所见,大陆解放以来,至少已有三部同名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在该省出版。相比之下,我们再出十部以上通史性著作也并不为多。此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研究,目前几乎还是一个空白,更极待填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现代和当代部分,尽管已有少量论文发表,

